

實現「習馬會」的政治意涵與突破

□荆轲元

如果「習馬會」在今年秋天北京APEC的雁棲湖舉行，這將改變中國歷史，也將改變世界格局，將中華民族的政治局面，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也會讓兩岸關係突破當前的僵局，開創一個全新的可能性。



這也將是繼1945年8月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握手後，海峽兩岸領袖的第一次握手，打破了兩岸分治以來雙方領袖「王不見王」的局面。這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讓兩岸人民、全球華人和全世界都了解，國共之爭不僅畫下了句點，還開創了新的想像空間，讓兩岸的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凝聚了全球中國人，見證了當前中國的偉大復興與和平崛起。

去年12月19日，馬英九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時表示，他願意出席2014年秋天在北京舉行的APEC（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並以代表台灣經濟實體領袖的名義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會晤。消息傳出，在兩岸引起轟動。

毋需拘泥具體政治條件

今年秋季在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看來是可以考慮「習馬會」的。馬英九再三強調，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這個會議，既然不是「高峰會」，不是「國家元首會」，應該可以考慮讓馬英九以「台灣經濟體領袖」的身份與會，並與習近平會面。就台灣來說，這就可以「超越公投和立法院限制」，減少不必要麻煩。如果能就此實現兩岸領導人會晤，這對馬英九個人及國民黨擺脫目前困境，突破兩岸關係政治僵局，將是大有好處的。

1989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成立。1991年11月，在「一個中國」和「區別主權國家和地區經濟體」的原則基礎上，中國、中國台北和香港

（1997年7月1日起改為「中國香港」）正式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如果讓馬英九以「台灣經濟體領袖」的身份參與APEC會議，並與習近平會面，也符合「一國兩制」方針。

只要不會造成「國與國」關係，以及「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格局會議的場合，都是可以考慮的。不久前國台辦發言人即就此重申說：只要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陸持積極開放態度。這也能顯示出北京的寬宏度量，大陸「以大待小」，在兩岸關係上，可以很有彈性，不拘泥於名分和具體的政治條件，而是先求形象的突破，在兩岸關係上打出一個突破口。

兩岸一次重要歷史機會

習近平說，兩岸問題應該解決了，總不能一代一代地拖下去；馬英九說，許多問題都涉及政治，兩岸的政治僵局必須打開。兩岸政治問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不能再拖了。「習馬會」是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應該盡快從戰略大局的角度出發，做出定奪。由於APEC的獨特安排，雙方領袖可以「輕操作」，不用為國號和種種政治協定而糾纏，而是可以扣緊政治符號的巨大效應，以中國人的身份，展示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

這也可能是北京與台灣一次重要的歷史機會，可以與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面對面的會談，因為台灣2016年下一屆的「總統」，可能是民進黨籍。馬英九的民望，這一年以來跌到了最低點，因而下一屆大選將可能二度失去政權，改由民進黨執政。當然，中國大陸並不害怕民進黨上台，也不怕它玩什麼新花招，但畢竟民進黨一旦上台會出現一些麻煩，也不排除會讓兩岸關係多走一些彎路，這不能不防。如果民進黨執

政，台灣與北京的和解與發展兩岸關係的前景，會越來越艱困，甚至是遙遙無期。由於該黨的「台獨黨綱」和背後支持「台獨」的民意，與北京缺乏「中國人的共識」，民進黨籍的「總統」不大可能前往北京會談，也勢將使兩岸關係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

相對地，馬英九作為一位湖南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國人」的認同，使他樂於前往北京實現「習馬會」。馬英九已沒有競選連任的考慮，但他更著重於自己的歷史定位，希望可以成為兩岸關係突破的領袖。台灣的輿論甚至認為，「習馬會」可以使他和習近平同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其實馬英九今天的低民望，關鍵是經濟太弱，人民的生活無法進一步改善。但如果和中國大陸有更多的經濟合作，同時讓更多的大陸遊客入境消費，就會刺激經濟上升，改善當前疲弱的局面。

「習馬會」也可能對島內的政治選舉產生影響。就在北京APEC會議之後，台灣今年年底11月29日舉行的「七合一」選舉，這是所有的地方議員和縣市長的權力洗牌，國民黨陷入苦戰，最壞的可能，是全盤皆輸。但如果「習馬會」實現，就會對國民黨的選情有「拉抬作用」。

對島內選情有積極作用

事實上，習馬會也可能對2016年的台灣大選，帶來連鎖效應。當前的民調顯示，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戰勝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的機會相當高。但民進黨的



▲「習馬會」若成真，必會成為開創兩岸關係的重大歷史性事件。圖為去年初習近平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單門」是兩岸關係，因為「台獨黨綱」而無法與大陸修好。若一旦「習馬會」實現，就會使台灣民意更了解，國民黨比民進黨更有能力在兩岸問題上取得突破，落實兩岸和平與繁榮，而不是整天在「打嘴炮」，逞一時之快。

對北京來說，「習馬會」也是一次主動的政治攻勢，團結了全球的中國人，延續了69年前國共兩黨尋求中國統一與繁榮昌盛的夢想。這也是習近平近年所提倡的「中國夢」的重要一環，不分黨派，只要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就可以大家坐下來共商國是，彌合歷史的裂痕。可以想像，在2014年的秋天，在北京郊區的雁棲湖，習近平和馬英九握手的鏡頭，將會震動世界，也讓台灣、香港和各地的分離主義者大受挫折。權衡利害，習馬會對北京來說，只有百利而無一害。這是難得的機遇，也是需要大智慧去抓住的決策，衝破種種的困難與雜音，為實現兩岸和平統一而努力。

讀者來信

李卓人要「杯葛」政改溝通？

□陳道理

香港某些反對派人物，其言行幾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中聯辦一年一度的新春酒會，向大部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發出邀請，但受邀者不僅沒有基本的禮貌回應，反而拿來玩弄政治手段。像工黨李卓人，甚至口出惡語，甚至要求全體杯葛。反對派不是要求溝通對話，為什麼連普通的酒會也要反對？於政改諮詢一事上，沒有溝通，何來互信？如此局面，政改豈有通過可能？

互信不易應盡力維護

李卓人叫喊要杯葛，市民要問的是，他杯葛的是什麼？到底是一場新春酒會，還是在杯葛來之不易的溝通機會？是要讓杯葛行動去達到破壞政改諮詢的目的，還是根本不想看到普選落實？反對派不是在抱怨沒有「溝通機會」嗎？為什麼連出席一場酒會都要反對？難道中聯辦的一場新春酒會會產生如此大的政治作用？

事實上，香港市民原本對雙方坦承溝通曾抱有希望。去年中，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破冰」之旅，與全體立法會議員午宴，開創了新的政治格局。當其時香港市民以為，隨著這種溝通成為恆常性機制，未來的政改問題將能在很大程度上很到解決。然而，令人極其失望的是，一方邁出誠意的步伐，另一方則不斷製造障礙，破壞溝通。

去年底，中聯辦發出「回請」，希望在西環的中聯辦大樓「主場」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就政改問題展開討論。但早前不斷要求溝通的反對派，卻又出奇地找

各種各樣的藉口，諸如「地點不對」、「不太方便」等等予以拒絕。令到一心促成會面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十分無奈。好了，如果正式會面「不方便」，那麼更多的「碰面」總可以了吧？但就在中聯辦一年一度的新春酒會中，向反對派議員發出邀請時，不僅遭到拒絕，甚至還有各種各樣的惡語相向。諸如公民黨的陳家洛，說什麼中央「圖窮匕現」、「毫無誠意」，「自己不感興趣，其他黨友也沒有興趣」；工黨李卓人更可笑，一方面說出席酒會是「門面工夫」，另一方面又自己拿着「請帖」四處張揚，博取曝光率，更要求全體反對派杯葛。

如此情形令人不禁要問：到底反對派想不想溝通？想不想政改通過？連面對面的溝通都怕得要死（或者說故意玩弄政治伎倆），又如何去讓分歧去收窄？難道通過每天在自喊自叫口號就可以？歸根到底，要讓香港的普選得以落實、政改得以順利通過，關鍵在於要形成一種互信與良性的互動。沒有互信，就算政改通過，也無法改變香港的根本問題。

設障礙無助落實普選

除了眼下的這些事例外，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諸如在台灣刊登支持「台獨」的文章與廣告、邀請「台獨」勢力參與「佔中」、到泰國學習「流血的暴力遊行方法」，以至對「衝擊駐軍」的極端行為置之不理「選擇性沉默」，這些莫說無助於建立雙方互信，甚至是在毀壞互信。如果連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實質管治權

也要質疑甚至試圖去推翻，這如何能夠建立互信？如果連駐軍的地位也要千方百計去破壞，如何能建立互信？如果連內地遊客來香港旅遊消費也要貼上「蝗蟲」的標籤、被視作是損害香港利益，如何能建立互信？哪怕反對派的「公民提名」方案最終有機會通過，這種敵視中央、敵視國家主權的態度，又怎能帶給香港人的福祉？

昨日在港台一個節目中，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說，在政改問題上，民主派的行動亦越來越激烈，中央政府的態度也漸趨強硬，特區政府處於被動位置，相信短期內難以解決這種情況。他並說，勉強通過一個政改方案，不能修補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裂痕，認為如果不解決政治上互不信任的問題，單憑通過政改方案，難以推動本港平穩發展。

劉兆佳道中了關鍵。但香港當前的政治現實是，就算中聯辦希望與反對派溝通，也無法獲得對方善意的回應。如果說出席新春酒會意在增進雙方好感的話，那麼，反對派的所作所為卻是在將好感變成惡感，將可能變成不能。

香港的民意其實很清楚，儘管雙方有着明顯的分歧，但市民希望雙方盡最大的努力去縮窄分歧。然而，反對派有沒有盡最大的努力？不僅沒有，相反卻是在盡最大努力去破壞溝通。這種局面持續下去，市民不可能看到普選落實的一天。我們希望立法會各大政黨，能拿出基本的禮貌與誠意去嘗試推動有建設性意義的溝通，最起碼，有共聚一堂的機會吧？

正思香港

陳志豪

春節前，藝人官恩娜在《明報》撰文，呼籲港人包容無可避免的文化差異，大家都是中國人，放下憎恨與歧視，不要自己人笑自己人。一如既往，此番論點隨即惹來大量網民狂轟猛打、肆意辱罵，嚇得官恩娜趕快聲淚俱下道歉求饒，《蘋果日報》亦以「包容出禍」及「包容論激民憤」為題作出報道。今時今日，呼籲包容，竟會激起猛烈的不包容！

值得注意的是，官恩娜並無政治背景，其文章亦非發表煽動仇恨的言論，沒有鼓吹犯罪、戰爭、歧視，也沒有謾罵和羞辱任何人，通篇文章可謂十分溫和正面。細心來看，官恩娜呼籲的是包容差異，而非包容「不好」，竟也引起連串口誅筆伐，可見本港的言論空間確實愈漸收縮，語言暴力日益盛倒理性討論，稍有知名度的人亦難以暢所欲言，百花齊放的言論空間漸褪色，教人心寒。

沒有寬容的言論氛圍，也就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空間。正如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所言，人們對於自由地發表言論有所顧慮，或許不是害怕政府的壓迫，而是由於社會的壓力：當一個人表達了一個不受歡迎的意見，他可能需面對社會的猛烈抨擊。至於語言暴力是否言論自由的正當體現？各位不妨參考一下現代觀點，依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人人在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亦負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最基本的要求是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名譽。網上的集體性語言暴力顯然是一種嚴重損害他人的名譽的行為，本質上是抵觸了行使言論自由所應具備的責任和義務。反對派一直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普世價值和香港的核心價值，神聖不可侵犯，為什麼他們一直對日趨惡劣的網上語言暴力視若無睹，隻眼開隻眼閉？

事實上，官恩娜的遭遇絕非個別例子，在過去一年，每當有藝人發表一些親政府言論，便會馬上遭到反對派媒體及其網絡支持者的抨擊、打壓、妖魔化，極盡侮辱之能事。反之，凡表達反政府言論的藝人，不論其言論水平，皆幾乎被捧成人民英雄，人氣急升，一邊聲稱無懼打壓，一邊繼續大放厥詞罵政府，曝光不絕，財源滾滾。這難道不是一種爭奪意識形態的策略嗎？久而久之，逐漸形成一種意識形態霸權，西瓜靠大邊，社會上的聲音愈來愈單一，辯論氛圍愈來愈薄弱，人們愈來愈缺乏反思的能力，或敢怒不敢言，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在一個萬馬齊喑的環境下，敢言的理性聲音更加需要支持和聲援。理性、開放和寬容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推動社會更加進步、多元的重要動力，我們不能任由語言暴力繼續侵蝕每位港人都珍視的自由空氣，香港不能失去理性、開放、多元和寬容的氛圍！

作者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聲援官恩娜的言論自由

馬年國際金融市場暗湧處處

□曾淵滄

今年是馬年，相信許多人都希望馬上發財，快馬加鞭發大財。不過，我們覺得今年不該跑得太快，反而應該步步為營，理由是目前的國際局勢暗湧處處，不得不小心。

2009年，美國開始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狂印美鈔，結果，美元氾濫，世界各地政府，特別是新興國家的政府，都面對大量游資湧入自己國家的金融市場所帶來的麻煩，帶來泡沫經濟，帶來通貨膨脹。

國際金融大鱷蠢蠢欲動

有些國家，政府與人民都樂見泡沫經濟，好好地享受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潮水來得快，退得快，美元，游資就像潮水一樣，來得快，退得快，潮水一退，就令人想起股神巴菲特的名言：「當潮水退了之後，就知道什麼人沒穿泳褲。」

馬年未到，阿根廷貨幣已經出事，今年，將主辦世界杯足球賽的巴西正在面對極嚴峻的經濟壓力，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知名的國際大鱷把中國的地方政府債、信託債、影子銀行……等等問題，形容為與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海嘯同樣的嚴重，很明顯地，國際大鱷正在蠢蠢欲動，先開始以言論

打擊信心，將來可以試圖一舉狙擊。

世界霸主的美國永遠有假想敵，假想敵包括軍事上的假想敵及經濟上的假想敵。實際上，沒有經濟力量也不可能支撐軍事力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經濟如日中天，開始威脅美國，於是美國逼日圓升值，打沉了日本經濟。九十年代，亞洲新興工業國崛起，於是出現了亞洲金融風暴，亞洲金融風暴是如何產生的？就是由美國的金融大鱷發起的。2009年美國狂印鈔票之後，美元貶值，不少國際資金及國家的政府儲備開始減少購買美國政府債務，以分散風險，歐元國債成了新的認購目標。於是，歐債危機爆發了，誰發動歐債的狙擊戰，答案依然是來自美國的金融大鱷，金融大鱷先借美國的所謂信貸評級機構把南歐諸國的國債評級大幅降級，一降再降，降至垃圾級，然後就是大鱷出手狙擊，沽空歐元與南歐諸國的國債……

相對安全的地方是中國

近幾年，全球經濟局勢中，出現了金磚四國、金磚五國的名稱，上個世紀的G2變成了G20，美國的經濟假想敵又多了，現在，美國正在集中力量打擊金磚

五國，中國正是金磚五國成員國，也是經濟力量最強的。近一段日子，金磚五國中的印度、巴西及南非已面對一浪一浪的狙擊，阿根廷與巴西是南美洲兩個經濟力量最強的大國，過去幾天，阿根廷已經被美國的金融大鱷擊敗。

2014年1月份開始，美國聯邦儲備局正式開始退市，美國的退市不是簡單的經濟調控，而是足以影響全世界金融體系的力量。過往在量化寬鬆政策下出現於新興國家的游資將急速消失，流回美國，這對新興國家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相對而言，目前比較安全的地方是中國。過去幾年，中國中央政府努力地壓住泡沫經濟的形成，外資儲備更有增無減，已立於不敗之地，更可能在外資新興國家遭到狙擊之時伸出友誼之手，出手相助。在外交上多交朋友，在經濟上發掘「走出去」的機會。擴大對外投資的規模。

目前，香港的基建工程正處於高峰期，加上梁振英政府的龐大建屋計劃，可以說馬年肯定是基建工程業的豐收年，參與建設的工人也是豐收的一年，工資會上漲得很快。不過，無論如何，經濟有周期，基建跑得很快，成本也會大幅上升。當工人享受超高工資一段時間之後，習慣了高工資，有朝一日，大型基建

完工，工人們就會面對工資大幅下降的壓力。那時候，很可能又會造成新的工業行動，就以紮鐵工人為例，目前這個工種的工資極高，但是數年前這群工人就發動過罷工行動，以爭取加薪。因此，在今年的基建高峰期，特區政府是應該開始估計，規劃將來這些基建工程結束後的經濟壓力。

港防基建高潮過後憂患

不少人認為任何基建，建築工程越早上馬越好，遲了工程成本一定更高。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估計，經濟有高潮低潮的周期，基建有高潮低潮的周期，適逢高潮期，建築費高昂，高潮期過後，建築成本也會下降，而不是永遠上漲。

2008年，中國中央政府看到國際金融海嘯來勢洶湧，全世界的人都對前途失去信心，於是推出四萬億基建的龐大計劃。但是，很快的，當美國也出手，並且大量印製鈔票之後，中國政府就決定馬上放緩基建的腳步，從而防止了泡沫的擴大。這是香港特區政府、香港企業界、小小的個別投資者都應該留意的故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